

抗战前私立南开大学 特色学术传统的生成及影响

彭泽平^{1,2,3}, 金燕¹

(西南大学 1. 教育学部, 2. 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3.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要:私立南开大学是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它能够在办学经费极度缺乏的战乱年代得到发展,离不开在实用主义导向下根据本土社会实际需要而开展的应用性研究。这种应用性研究是私立南开大学“产、学、研合一”学术传统形成的重要条件。这一特色学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为私立南开大学自身发展筹得了部分经费、影响了学生的职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教育独立”思潮,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缩影,而且也同时为其他高校的发展提供了示范。全面考察私立南开大学特色学术传统的形成过程及其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而产生的积极影响,有助于正确评价私立南开大学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私立南开大学;特色学术传统;产、学、研合一;教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6)03-0070-07

张伯苓作为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和爱国教育家的优秀代表,其办学思想与实践历来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者已对其办学理念、办学精神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他在教育管理、体育等方面的真知灼见与实践也为研究者所关注和重视。在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今天,深入挖掘和借鉴教育家办大学的有益经验,是凸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特色、争取教育国际话语权的有效路径。由张伯苓主持开展的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实践,无疑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早期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图景。私立南开大学能够在办学经费极度缺乏的动荡社会环境中克服困难不断前进,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不吝乐捐以及校长张伯苓的多方努力息息相关,更与私立南开大学面向社会实际需要而开展应用性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学、研合一”的特色学术传统有着重要的关系。针对社会实际需要而开展的应用性研究是私立南开大学“产、学、研合一”这一特色学术传统生成的重要条件,而这一学术传统的生成又为应用性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资金保障。本文通过梳理抗战前私立南开大学特色学术传统的生成过程,分析这一学术传统给当时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而对私立南开大学在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

收稿日期:2016-03-04

作者简介:彭泽平,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员。

金燕,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创新研究”(10JYA880112),项目负责人:彭泽平;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点培育项目“抗战大后方职业教育研究”(CQKZ20130201),项目负责人:彭泽平。

一、实用主义教育影响下的早期学科建设和学术风气

20 世纪初,尽管各路军阀同室操戈使得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但“五四”以后自由主义思潮和科学教育观念的盛行还是为私立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然而,当时的中国私立大学没有自主办学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师法他国办学经验成为我国早期私立大学办学的有效途径,私立南开大学也是如此。鉴于当时社会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教育是推动日本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张伯苓和严范孙决定取道东洋。然而,张伯苓经过考察发现,日本现代教育在封建教育的母体中发育,“性近专制,为造成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1]104-105}。这与他追求教育民主、科学的理念相悖,于是他转为师法美国。1908 年,张伯苓作为直隶省代表前往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同时考察了美国教育。在回国途经欧洲时,他又参观了欧洲学校。欧美的文明开化以及民主的教育制度深深地感染了他,正如他所说:“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来”^{[1]105}。1911 年 4 月,张伯苓受清华学堂副监督范源濂邀请而出任清华学堂教务长。在清华学堂,他领略了国内学校学习美国教育模式的风气,之后又受到杜威访华所刮起的实用主义风潮的影响。从国外的考察到对国内学习美国办学模式的深切感悟,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特色深刻地影响了张伯苓的办学思想,并促进了私立南开大学办学模式的形成。国人办学旨在振国兴邦,张伯苓在谈到兴办教育的目的时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种愿望。他说:“教育之目的无他,在求此解决吾华困难问题之方而已。”^{[2]93}实用主义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其教育理想契合,并影响了早期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

(一)实用型学科建设

在私立南开大学成立之初,学校确立了以造就各种具有基本能力的“干才”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目标,这表明学校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国立北京大学特别注重纯学术研究相异的发展之路。在同一时期,其他私立大学主要设置文、法二科。然而,私立南开大学在建校初期就设置了文、理、商三科:文科下设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八系;理科下设置算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六系;商科仅包括普通商学、银行学和会计学三系,下辖国外贸易、银行财政、商业组织三个专业方向。1921 年,学校“接受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绅捐款,增设矿科”^[3],不分系。尽管文科科系庞杂,并且是兴办商科必不可缺的基础,但它还是无法与理科、商科成鼎足之势,而商科则成为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

建立这种看似不合理的学科格局,一方面是由于在艰苦环境下办学资金筹措不易,更应该把募集到的办学经费用在社会急需人才的培养上,而不能引导更多的人为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耗费一生的精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张伯苓对其“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思想的践行。张伯苓从来都毫不掩饰自己对商科的偏爱,他说:“我的理想,如何实现,在办教育,所恃靠的人,即你们商科的学生”^{[2]147}。1926 年,黄钰生在其提出的改革文科、加强实用学科建设的计划书中更是将文科合并为五系,以经济、政治为主,以教育心理、历史、哲学为辅。“无论其为应用、为学理,政治与经济,‘其研究之对象,当然以中国之政治经济为主体,为实用计’。”^{[4]203}文科建设亦遵守实用原则,以造就实用之文科人才为要。由此,以实用学科为重心的系科建设为早期私立南开大学学术传统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早期“重教学轻研究”的学术风气

办学资本的极度缺乏迫使私立南开大学不得不放弃纯粹研究高深学问的办学宗旨而采取实用主义导向下的以教学为主的办学模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与当时国立大学风格迥异的学术传统。

由于私立南开大学办学完全是“个人兴学”行为,在办学经费上得不到政府的强有力支持,所以

经费充足与否成为决定学校能否持续办学的重要因素。从 1929 年国立清华和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对比来看,私立南开大学办学经费只有 220 126 元,而国立清华大学因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其办学经费多达 670 000 元^[5],并且还得到“庚子赔款”的支持。经费的短缺使私立南开大学缺少成为像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的研究型大学的必备条件。早期私立南开大学主要以教学为主,正如黄钰生所言:“南开大学为经济所限,不敢奢谈研究,她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a teacher institution),间或有点研究”^{[4]787}。然而私立南开大学并不是自己甘愿走出高深知识研究的殿堂,而是因办学经费极度缺乏而欲维持办学的无奈选择。何廉也谈到,在当时的学校教学中,“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 4 门、每周 3 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 12 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6]39}。因此,当大学部主任凌冰看到终日为学务所累的学生竟成立了科学会时,他欣慰地说:“大学自开学以来,学生均忙于功课,是以课外组织颇少,今日诸君自动地组织科学研究会,实胜庆幸”^{[4]446}。繁重的教学任务和侈谈研究的风气使何廉产生了离开私立南开大学的想法,最终因校长张伯苓同意减少其授课时间并接受其改革大学教研体制的建议而作罢。政治学教授萧公权在私立南开大学两年半的时间里,虽然每周授课时间只有 9 个小时,但是“所用于准备教材的时间大约五倍于此……而蒋廷黻在南开的数年间,尽管在学术上有所积累,但响当当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据其自称只有一篇”^[7]。

早期私立南开大学在实用主义导向下采取“重教学轻研究”的办学模式是张伯苓校长基于社会现实的考量。他一贯主张发展实业教育以强国,正如他所说:“现代科学之昌明,工、商、农界都有新的发明和新的组织,我希望南开大学能造就出一班有组织能力之人,以发达中国的实业而谋国家的富强”^{[2]147}。何廉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张伯苓在实用主义导向下强调以“教学为主”的办学理念时指出:“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他承认一些人文科学课程的必要性,但认为在中国急需有实际训练的人才之时,如果将人的一生消耗于这些人文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上有什么意义。”^{[3]212}由于这种理念与学校内大多数受过“哥大式”或“美式”自由教育和学术理论研究熏陶的教授们的志趣严重偏离,因而直接酿成了 1929 年一大批知名教授出走的“悲剧”,而私立南开大学也因此遭遇了自建校以来的第一次办学危机。从此,私立南开大学开始在“危”与“机”的夹缝中踽踽独行,并着手为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努力。

二、抗战前本土化学术研究的开展及特色学术传统的生成

美国的实用主义办学模式为私立南开大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由于对这种模式的盲目崇拜也为其早期的办学失败埋下了伏笔。1924 年“轮回教育事件”的出现成为探索“教育本土化”发展路径的导火索,而 1929 年“教授流失”事件的发生则促使学校领导者不断反思先前重实用性教学而轻研究的办学模式所带来的弊端。由此,学校领导者从对美国教育模式的盲目崇拜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探索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办学模式。这次探索肇始于 1926 年前后,学校将教学、研究与社会调查联系起来,设立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课程,同时广泛地设立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研究所,并且将研究成果运用于企业生产,从而使新的办学模式在与企业合作的实践中逐渐完善、定型。

(一)基于本土社会实际需要的系科建设和课程设置

在教育救国理念的影响下,校长张伯苓从一开始便把实用学科的创建作为私立南开大学发展的中心工作。“到 1926 年,南开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全国公认的高等学府之一了。它包括四个科——文、理、商业、矿业,学生总数超过了 500 人。”^{[6]34}为了更好地发展以及避免与国立大学竞争,私立南开大学利用私立大学相对自主的办学权,以中国社会实际需要为导向,集中优势资源,开创

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系科,在危机中找到了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比如设置了电气工程系。而当时设置电气工程系的高校,“除上海交通大学外,尚未多见。我校开办斯系,实为华北各大学空前之举,对吾国电气工程学界尤增益不少”^{[4]204}。除此之外,私立南开大学又相继设置了化学工程系、电机工程学系以及机械工程学系。同时,学校在文科类系科的设置方面也力求与社会实际相联系,针对社会实际需要而设置了一系列课程,如设置了“当代中国政治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等课程,有助于学生在内乱不断的动荡社会中了解国事。学校还“增设了与广大贫困农村相联系的课程,如‘乡村社会学’、‘乡村建设概论’”^[8],以鼓励学生参加农村建设,增强服务农村的能力。此外,学校同时还开设了“读书指导”“新闻写作”“讲演”“应用心理学”“售货学”“办公室管理”等课程,以加强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私立南开大学新设置的专业和开设的课程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适应了当时民族工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由此,私立南开大学形成了以学校发展为主体、社会需要为导向,学校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联系的新格局。

(二)从“学、研结合”到“产、学、研相结合”

基于私立大学经费短缺的弊端而采取的“重教学轻研究”的办学模式直接造成了教师队伍内部的分化。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促进学校教育发展,私立南开大学重新审视“学术研究”的价值,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逐渐把教学、学术研究以及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结合起来,开创了“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

何廉认为,教师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其学术研究不断丰富和持续,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则必须通过“课堂教学与实地调查研究相结合,使学生能将所学理论结合专业实践”^{[4]393}。为了保证研究取得实效,私立南开大学确立了三条标准:“(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亟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4]39}。因此,从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小试牛刀,到“经济研究所”的成立,再到“应用化学研究所”“东北研究会”“边疆人文研究室”等相继建立,教学与学术研究逐渐融合。随着“经济研究所”与“应用化学研究所”的相继成立,学校教学、学术研究与研究成果的运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首先,“产、学、研相结合”体现在人文社科方面。以“经济研究所”的成立为例,该所于成立之初就在天津市内开展广泛的经济调查,其调查内容涉及工人生活费指数以及新式工业的发展情况。后来其关注范围更超出了天津这一地域而扩大至华北、河北及山东地区,其关注的内容也不局限于生活费指数,而是扩大到乡村工业、区县财政和地方行政等方面。其中,在工业方面开展了对“天津地毯业、织布业、针织业、粮食业、磨坊业、鞋业及天津棉花远销的调查”以及对“河北省高阳县织布业、宝坻县手工业、中国煤矿及十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9]。这些调查有助于师生了解工商业发展现状以及社会经济形势,同时也为工商业布局、市场价格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产、学、研相结合”体现在与社会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实用类学科方面。学校不仅将学术研究成果作为校办企业办理的理论支柱,而且与社会企业合作,将其投入社会企业中。以化学研究所为例,该所在成立之初就将其目的确定为:“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业改善其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4]206-207}。该所下辖化学部、制造部和咨询部三部,职能各异,各司其责。咨询部负责解答各界关于化学工业的问题,而化学部则负责专门化验和分析各种物品,在国内创造性地率先采用有偿服务的形式,对委托鉴定化验的物品,“以化验时所用药料价值之高低及化验手续之繁简酌收化验费”^{[10]6}。这就拓宽了学校办学经费的来源,至少为化学研究所的正常发展提供了资金上的资助。制造部则用研究出的新方法自行制造各种物品,并把所产物品投放市场以供社会所用。“化学研究所于1934年成立

了南开化学工业社,1936 年改建为研究所的试验工厂,曾生产硬脂酸、甘油、钾皂、酒精、黄铅粉、红铅粉等供应市场。”^{[11]340} 化学研究所此举真正促成了私立南开大学“产、学、研相结合”这一学术传统的形成。这一学术传统或办学模式不仅在私立大学中一枝独秀,甚至在整个高等教育界也独具特色。

三、私立南开大学特色学术传统的影响

“产、学、研相结合”的特色办学模式或学术传统,不仅促进了学校实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和办学经费渠道的拓宽,同时也为因经费短缺而陷入发展困境的其他高校提供了办学范例。基于这一特色学术传统的办学实践无论是对私立南开大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对其他高校的发展而言,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办学经费渠道不断拓宽,教育经费相对独立

在政治影响教育、经济决定发展的传统社会格局下,大学的发展有赖于当政者对教育的态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如果当政者重视,学校则大兴;如果经费充裕,学校就能维持下去,否则难以维持。在军阀割据的动荡社会,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因此,许多私立大学在既缺乏政策支持又缺少资金援助的情况下无奈地被迫选择关停。然而,私立南开大学却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导向,强调“本土化”办学理念,开创了“产、学、研相结合”的学术传统,以良好的办学声誉,不仅赢得了社会人士和社会团体(包括国际社会财团)的资金支持,更是通过与合作企业而获得经费援助。例如,“太平洋国际学会拨给专题调查费,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从 30 年代初就给予捐助,每年 15 000 元”^{[10]181}。“1933 年天津利中公司拟请外商包建一座年产 3 万吨的硫磺厂,费用就高达 25 万元,而应用化学所承担了该项目,只收取了 13 万元。不到一年酸厂建成投产。”^{[11]340} 另外,学校还成立“化学工业社”,利用掌握先进生产方法之便,生产出多种类的产品投放市场,以此筹措资金维持日常开销。化学研究所还代理一些厂家的研究项目,如:“为达仁堂药店研究蜂蜜脱臭,为《大公报》研制合金铅字,为桅灯厂研制手电灯反光镜等,不仅急厂家之所急,而且收费合理,以至远到包头电气面粉厂、昆明革辫厂,都来洽谈委托研究项目”^{[1]321}。除此之外,学校还投资实业,如“联合创办华北实业公司,在内蒙古、宁夏河套地区开办萨拉齐农场,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经济;与金城银行等单位联合,组织华北农产改进社等”^{[1]321}。这些措施的推行减少了学校对政府的依赖,为学校在获得政府有限支持的情况下维持正常办学提供了保障。

学校把研究成果用于校办企业,并与社会企业合作而获得办学经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私立南开大学通过自身实践对“教育经费独立”的呼声作出的回应。尽管这种教育经费的相对独立是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的,是一种个体行为,与当时普遍“要求政府划出固定经费以保障教育正常发展”的呼声并不一致,但这毕竟是私立南开大学以自身实践对教育独立思潮的响应。

(二)坚持学术独立,培养实用型人才

学术独立是大学生生命力的象征,是学校自主发展的重要表现。私立南开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造就理论人才为主,而是以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影响师生,坚持学术独立,培养实用型人才,这体现在学校对待西方教育模式的态度以及学生的出路上。首先,学校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提出“本土化”发展思路,确立了为社会工商业发展造就实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这一实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有助于教师从办学理念上破除对西方教育模式的迷信,将精力集中于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本土化学术建设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有益于实业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在学校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校长张伯苓始终坚持教育必须从根本上独立于政治的信念,这表现在其超然于政治的学术品格上。“当十五六年之交,政府谬采虚声,拟畀苓以教育总长,

及天津市市长等职,因志在教育不在政治,均力辞不就,仍一心办理南开。”^{[12]254}在许多教师因大学经常欠薪而不断外出兼课的情况下,私立南开大学的大多数教师亦能够保持超然于名利的学术品格而坚守在南开大学的讲台上。即使在私立南开大学获得南京政府扶持的情况下,张伯苓也“依旧坚持自治学校的立场,学校没有积极贯彻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方高等教育方针,各种学生团体及其活动也不受南京国民政府相关规定的限制”^{[13]137}。

其次,把造就实业人才作为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也使得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政治的影响,而广泛地投身于社会实业,这表现在他们毕业后的流向上。表 1 反映的是 1932—1934 年私立南开大学学生的毕业流向情况。

表 1 1932—1934 年私立南开大学学生的毕业流向^{[14]337}

职业分类	1932 年		1933 年		1934 年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教育	107	33.13	119	32.87	136	33.0
商业	58	17.96	65	17.96	84	20.39
实业	22	6.81	29	8.01	35	8.50
文化	18	5.57	22	6.06	28	6.80
军政	23	7.12	24	6.63	19	4.61
交通	19	5.88	18	4.97	20	4.85
海关与税务	5	1.55	6	1.65	13	3.16
不详	71	21.98	79	21.85	77	18.69
总数	323	100	362	100	412	100

从表 1 可以看出,毕业生主要流向教育、商业、实业、军政以及交通等部门,但军界、政界对学生的吸引力不高且逐年下降,而实业界和文化教育界在吸纳毕业生方面的能力则显著增强。毕业生职业选择的多元化,对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否认私立南开大学的特色学术传统对促进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三)特色学术传统为其他高校提供了示范

私立南开大学放弃纯粹的理论研究,注重根据社会实际需要而开展应用性研究,并通过校办企业或者与校外企业合作而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办学模式体现了私立南开大学的学术传统,不仅拓宽了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因经费缺乏而陷入发展困境的其他高校提供了示范。从同时期其他大学的发展就可以看到这种办学模式的影子。如复旦大学明确提出:“纯科学的研究,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研究,在大学中诚然也占有一个位置,然而,我们学校特别重视国家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以后当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实际的问题,而不专崇尚研究院式的理论研究。”^[14]为此,复旦大学与中国茶叶公司合作成立了茶业研究组,并附设茶叶研究室。“研究室分三部:一为生产部,从事茶叶生产制作之实验与研究。二为化验部,从事茶叶之化学的分析与实验研究。三为经济部,从事茶叶经济行政及政策之调查研究。研究室内并附设实验茶场、茶叶化验室与茶叶资料室。”^[15]复旦大学注重“产、学、研相结合”,为我国茶叶产制技术的改进和对外贸易的扩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云南大学矿冶系也先后与资源委员会炼铜厂合作研究炼铜技术,并参加滇北矿务局对马尾丝铜矿的“浮游精选”研究,同时“农学院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办酒精厂,后又获得云南企业局烟草栽培试验费 10 万元,进行栽培试验等”^[16]。岭南大学也依托于自身的研究技术,开办食品公司、日用品公司、牛乳厂、蚕丝厂等,不仅为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亦为学校自身发展补充了经费。

私立南开大学能够在战火不断的动乱年代生存和发展是个奇迹。尽管这个奇迹的发生得益于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及校长张伯苓与徐世昌、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但我们丝毫不能否认特色学术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特色化的办学实践不仅拓宽了其办学

经费来源渠道、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增强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而且也为同一时期其他高校的办学提供了示范。私立南开大学“产、学、研相结合”的特色学术传统在那战火不断的动乱年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它在形成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值得我们反思。首先,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如何使我国高等教育既保持宽广的国际视野又体现本土特色,这仍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三者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这依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另外,在经济利益驱使和个人私欲膨胀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教育者应如何保持其超然的学术品格、灼灼的道德情操,这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梁吉生.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2] 张伯苓. 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王文俊,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3] 梁吉生. 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4:212.

[4] 王文俊,等.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5] 宋秋蓉. 1929 年私立南开大学教授流入国立清华大学的分析[J]. 现代大学教育,2012(3):44-49.

[6] 何廉. 何廉回忆录[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7] 王昊. 大学特色与学者识见——略论私立南开大学特色学术的生成[J]. 民办教育研究,2007(6):84-87.

[8] 秦俊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家办大学研究[D]. 保定: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132.

[9] 郑致光. 张伯苓传[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78.

[10] 宋秋蓉.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1] 赵匡华. 中国化学史:近现代卷[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12] 崔国良. 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13]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 南开大学校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14] 宋秋蓉.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办学成功的因素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2003(5):99-103.

[15] 颜莉冰.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科研活动特点研究[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8-11.

[16] 张意忠. 民国大学校长[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45.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 of Specific Academic Heritage
of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PENG Zeping^{1,2,3}, JIN Yan¹

(1.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2.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3. China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is sparkling in the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reason she could survive from a war where serious deficiency of financial resources exists is her academic heritage, namely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which generated from the Pragmatism and aimed to satisfy the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heritage,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not only obtained educational funds, but also affected the career of students and to some extent took concerted action with educational independence. Simultaneously, as an epitom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heritage became a demonstration for the reform of contemporaneous universities.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heritage and inspecting her effor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re conducive to assess the dedication of 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Key words:Private Nankai University; specific academic heritag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